

中國家庭與現代化：傳統與適應的結合

孔 邁 隆

Myron L. COHEN

本文擬探討中國家庭組織的傳統特徵與現代化過程的幾種客觀條件的相互影響。作者無意全面分析傳統中國家庭的動力或深入探討其在現代化之下的各種變遷。下文只就現代化中新舊因素相互影響的幾個重點來申明：(1)經濟、社會、科技及其他新的因素因為明顯的需要而與原有社會秩序發生相互影響，因此，社會變遷在中國必有其獨特的文化色彩(原則上其他社會亦同)。(2)像中國一般複雜的傳統社會裏，全國性及區域性的文化發展均具長遠的歷史，因而兩者在文化和社會組織上除必有明顯的共通之處外，亦應有因應地方特質而發生的調適，因為基本的社會模式必順應各地特有條件而有不同的反應。

西方的社會學與人類學者大致循兩種途徑探討中國家庭組織。第一種是從理想家庭制度與實際家庭安排的關係着手來描述中國傳統的家庭。理想與實際家庭的差距是以中國整體為單位來討論(Lang 1946; Levy 1949; Freedman 1979a, 1979b)，其結論是數代同堂的家庭雖是中國人共有的理想，然而實際上只有少數富裕的家庭才能達到這理想。簡言之，這一種研究途徑認為大部份中國人的家庭是普遍的理想與實際的經濟條件(如貧窮或人口、經濟壓力)之間的一種必然但不充分的折衷。

近來出現的第二種研究途徑着重分析傳統家庭組織的區域性及時間性差異。這些新的研究考慮到重要的人口及結構差異，並試圖了解在有關傳統家庭安排上，標準家庭、童養媳及招贅婚、離婚、寡婦再婚及各種收養方式等等的發生比率及原因。但這類近期的研究都有一個重要的問題尚待解決。一方面，學者展示各種不同形式的婚姻之分佈是有其原因的：如Pasternak和Wolf 就清楚地證明中國某些地區招贅婚及童養媳普遍發生的情況並非偶然。各種婚姻的分佈和差異都反映中國家庭對地區性經濟、生態和社會環境的調適。更且，某一地區的非標準的婚姻形式亦非權宜的安排，而是有傳統習慣及地方性習俗所支持與規範的。因此，這些安排都是具有正面意義的：至少人們普遍遵守，並認為這種安排是恰當的。可是另一方面，學者又認為這些安排是因形勢所逼而偏離理想模式的反應。

比較起來，分家的程序有既定的習慣，並且普遍為人接受。各地都有十分詳盡的分家程序，因為父子之間、已婚兄弟之間或在某些情況下堂兄弟之間的分家畢竟是無可避免的。但分家同時又與傳統的家庭延續及和諧的理想產生衝突。雖然分家不能說是合乎理想，但還是有為一般人所接受的標準來規範其運作。因此，分家不能完全視作違反傳統標準，因為其本身是約定俗

成的。但關於分家的人類學研究必須面對一個問題：若分家是無可避免的，為何有些家庭能持續較長的時間而不分家？換言之，維持家庭團結亦可以視為對某些經濟或其他條件的正面性和調適性反應。但若上述的解釋成立，則必須接受分家本身在不同情況下亦是正面及有意義的反應。因此，分家時間的不同反映出個別家庭在不同情況下不同的正面調適。與此同時，分家又被認為是違反了被廣泛接受的對家庭生活的期望和目標。

近期學者對分家或非標準婚姻的研究都有一個矛盾，就是這種行為一方面被視為是由文化所界定的對特別區域情況的正面回應，但另一方面又被視作是違反地方性及全國性的價值或家庭理想的反面回應。這個衝突在於一事物不可能同時是正面的又是反面的。而且，這矛盾不能用地方性習慣相對於全國性理想的觀念來解決，因為全國性的理想亦是地方性因素的一種。舉例來說，研究不同婚姻形式的文獻本身就指出當地區情況有所改變，地方習慣有趨近全國性理想的傾向(Wolf and Huang 1980)。

作者相信脫離上述困境的方法在於分別傳統觀念與價值中有關家庭的兩個廣泛的類別。我們可以稱第一類為“終極期望”(ultimate aspiration)。這些都是傳統的理想，例如家庭的大小及延續。第二類傳統信念與價值中屬於“生活經營”(life management)的：這些都是緊密連接着傳統社會秩序和實際生產組織的。例如招贅婚，我們一方面可視之為未能達到“終極期望”，但在某些特定條件及時間下，它可能完全符合當地的“生活經營”。童養媳和招贅婚都有顯著的契約性，這就說明它們與“生活經營”的密切關係：在契約的原則下，這些婚姻安排都是有彈性的，每個婚姻都是特別的安排，也就反映出協議時男女雙方的地位。因此，不能為“終極期望”所接受的安排，在“生活經營”的角度來說卻是正確的選擇。

但傳統中國家庭及生活其他層面的研究所未能解決的問題正是“終極期望”的實質形態及其對社會各階層的影響程度。例如西方對中國家庭的研究就常常說“聯合家庭”(joint family)(父母與至少兩個已婚兒子同住)乃中國人共有的理想。“聯合家庭”既是如此崇高的理想，但實際上又不常見，因此，Maurice Freedman (1966: 49)，便提議改稱“聯合家庭”為“巨大家庭”(grand family)。近來Arthur Wolf (Wolf and Huang 1980: 68)沿用“巨大家庭”一詞，並指出所謂“聯合”家庭或“巨大”家庭在型態上的定義是至少兩個已婚兄弟未有分家。Wolf的論點是：一生中至少有一段時間是屬於“巨大家庭”一份子的農民數目要比學者以往所想像的要多。Hanley與Wolf (1985)用“巨大家庭”一詞描述包括中國、南亞及東歐的傳統家庭：當新家庭經由分家而產生，若兄弟仍住同處，便形成“聯合家庭”。很明顯的，“聯合家庭”對Freedman來說屬於“終極期望”，對Wolf來說卻是屬於“生活經營”。換言之，Freedman的“巨大家庭”是人所共有的理想，但實際上卻很少能夠實現。但同樣的“巨大家庭”對Wolf來說只是量度某地整體家庭制度的指標。尤其用在中國，“巨大家庭”只表示兄弟同意不分家所形成的家庭型態。而且由於有相當證據支持Wolf關於“聯合家庭”在傳統社會中普遍存在，因此，他使用“巨大家庭”一詞便有問題了。用“巨大家庭”一詞專指至少四或五代同堂的家庭似更為合適。這樣的家庭無疑很罕見，而且至少對一部份人來說，這種家庭也表示他們的“終極期望”。雖然“五代同堂”對絕大部份中國人來說是高不可及的理想，但在平分家產的前提下，男子必須分家的根深蒂固習慣和維持家庭團結的“終極期望”便發生衝突。

現在讓我轉到所謂“生活經營”的信念、程序和價值，亦即是有關生產組織的傳統社會模式。有一點必須先加以說明，就是這些模式實際上是一連串有關應付社會、經濟問題的選擇；這些選擇是由習俗所規範的，而且必須與農民面對饑饉、戰禍及洪水等天災人禍時所作出的求生掙

扎分別清楚。而且，這些約定俗成的選擇雖然未必是最合意的，卻仍是被認可的。可以肯定的是這種認可是文化性的，因為選擇本身已經是由習俗所規範的程序。並且在“生活經營”範圍內的某些選擇是中立的，另外一些很可能與“終極期望”的價值觀相脗合。

一般來說，“生活經營”是指積極的抉擇過程。這過程又是超越過去學者所分別的“實際”與“理想”，因為抉擇過程有助於決定兩者的關係。“生活經營”當然包括家庭組織上最有彈性的特點，能因應各種經濟及其他因素而改變。這方面的家庭生活包括農耕的社會性安排，並且反映出農民家庭乃經濟生產及維持的組織的事實。家庭同時又是子孫繁衍和家庭教育的組織。可是這方面的家庭生活若是大體上由農村經濟決定，則它決不局限於這些。中國農民長期以來在逆境中掙扎生存的經驗無疑加強了這方面的家庭組織，並使家庭絕不單只限於農務方面。

維持家庭的行為中又有幾種與家庭在變化多端的情況下靈活調適有深切的關係。父權在農民家庭中當然十分重要，但作者以為在日常家庭生活的組織和分工上，父權並非絕對而無節制的。父權大體上是要被成年兒子接納，而他們接納父權又是因為父親最能為家庭的整體利益打算：因為父親不處於兒子可能遭遇的困境，一方面要顧全大家庭的利益，另一方面又要顧及自己妻子兒女的需要。換言之，父親處於家庭結構中最便於管理家庭的位置。父親管理有方，他的地位就愈鞏固。父子間的分家常有研究報導，例如Fei (1939)。結論似乎是家庭的成員若不滿意父親的管理，父親就很難維持他的地位和權力，可是問題在於清楚區分父權在家庭管理上的效力與兒子對父母的一般性責任。從“生活經營”的意義上來看，父親的地位的確是會有重大變化，以致他不再積極控制家庭事務。但如費孝通(Fei 1939: 66-68)所指出：雖然如此，兒子對於父母的責任仍在。兒子的責任不變而父親的權力被大大削弱這一事實正表明“終極期望”與“生活經營”二者分別之重要性。

家庭組織中有關“生活經營”的另一特徵是合夥經營(income pooling)。家庭若無成員在外賺取工資，則合夥經營便以家庭勞力的分工合作來表達。但農村家庭往往要將收入的來源分化，因為只有在合夥經營下，分化及分工才能達到提高整體家庭生存機會的功能。由於成員的收入都混同起來，家庭的管理就更加複雜了。家庭管理不單只包括成員間的關係和農務，更包括了在農務或非農業生產上的家庭勞力分配，以期使家庭收入達到最高。因此，合夥經營在工作分化的情況下亦能繼續維持下去。

職業的分化對農民或其他階層來說是一個十分重要的策略。在極端情況下，這可能是為求生存而掙扎，但對其他收入足以維持生活的農民來說，經濟分化無疑是為了改善家庭的經濟狀況。經濟分化常與居所的分離連在一起，農民家庭及其他家庭常常有某些時間成員分住不同的地方。經濟分化及居所分離都是家庭管理的一部份，在較簡單的情況下，成員可能只須分配到家庭附近的農田工作。但必須注意的是：這方面的家庭生活都是在“生活經營”的範圍內。家庭的各種管理方法可能與“終極期望”會有若干關係，但它們根本上只是有習俗支持的一種手段，所以即使“終極期望”有重大轉變，這些管理方法仍會被沿用。

在探討現代化對中國家庭生活的各種影響時，本文將集中注意力於三種與現代化有關的變化：工業化及大型企業的出現，由於科技引進而產生的經濟基礎的發展和價值觀及意識型態的改變，即是“終極期望”的改變。

大家都知道工業革命不只限於大型工廠的發展，更包括高度的分工以及各種大規模的組織(例如銀行業、通訊、教育等)成為現代化中相當重要的部份。工業化及大規模企業的發展對中國受現代化衝擊最強的地區有兩個重大的影響。首先是靠工資維生變成日益重要的經濟活動：

依賴外界的工資表示家庭逐漸不再是一個經濟自足的單位。靠工資維生在中國雖不是嶄新的經濟活動，但在現代化先進的地區，靠工資維生的人口比率大幅增加，相對之下，依賴家庭為主要收入的人口就減少。第二個重大的影響是大規模企業發展帶來的重大變遷，就是生產組織趨於龐大。在傳統的中國都市裡，靠工資維生人口的比率顯著地較農村為高，但不論都市或農村的工資賺取者，大都是在以家庭為主要組織的農村或市鎮店舖裡工作。靠工資維生而不住在本家的人顯然在經濟及社會地位上受控於資方及其家人(Fried 1953)。工資賺取者與資方的關係在家戶的環境中必然是密切的，靠工資維生的人雖與其本家分開，但仍然是處於另一個以家庭組織為本的經濟單位中。

無論在傳統社會或處在現代化過程中的社會，因家庭經濟分化策略而離家工作賺取外界工資的成員與本身收入是家庭經濟唯一來源的工資賺取者有着相當重要的分別。有不少報導指出若情況許可，靠工資維生的人通常只將所賺工資的一部份交給家庭。隨着現代化的發展，離家工作和補貼家計的重要性將日益增加。Olga Lang (1946)指出早在1945年，約有一半她訪問過的北京工人都自認是農村家庭的一份子。只要他們還是家庭的一份子，他們仍然在家庭管理的結構之內；若家庭的經濟情況有所改善，他們便能夠回家並重新全面投入家庭的經濟體系中。對這些人來說，他們的經濟選擇不單只由都市環境決定，並且還受家庭的影響。

農村家庭和都市家庭對離家工作成員的控制明顯是與家庭本身的經濟狀況有關；但在都市工作的成員對他們農村家庭的不同態度顯示“終極期望”與“生活經營”的區分對研究現代化的影響是十分重要的。上面已提及傳統家庭在“生活經營”上的力量源自它是一個整合的經濟單位。若家庭成員的生計依賴家中的分工合作，則管理的責任與分工的安排都會由一個清楚分配的勢力支持。都市或農村家庭的收入若大部份是靠賺取外界工資的話，那麼以家庭為本的權力結構便會減弱。但只要父母與子女間的關係或長輩與晚輩的關係是受“終極期望”範圍內的傳統價值觀所規範，則工資制度經濟的發展與傳統價值觀的衰退沒有必然的關係。當然這不是否認現代化在很多方面都與“終極期望”的改變相關，只是要說明研究現代化對家庭生活的影響時，必須先區別現代化過程中的各種因素，然後區別與“終極期望”有關的價值觀和習俗，以及與“生活經營”有關的另一些價值觀和習俗。

倘若大規模企業興起和工資制度普及等現代化因素可能會削弱傳統家庭的經濟組織，則另一些現代化的因素可能反而強化了這種經濟組織。科技引進，農業技術的改善，通訊設備的發達，以及其他各種經濟基礎結構的發展都不一定是必然與家庭控制的經濟活動發生衝突。近期不少中國的社會學及其他相關的研究都着重探討科技引進、農業現代化與經濟組織規模的關係。關於在生產責任制下出現的專業戶的報告清楚顯示現代商品化農業與複雜的多元化分工都能在家庭組織中發展(馮與湯 1983；華 1984；周 1985)。在台灣的田野調查也十分清楚地顯示作為一個經濟單位，中國農村家庭能夠並且因為吸收現代科技而維持團結。

因此，某些現代化的條件是可以容許新的家庭企業發生的。科技引進、農業技術的改良、通訊的普及和市場的開拓，都為家庭提供良好的經濟環境，提高了家庭經營成功的可能性。這些經營都需要家庭直接利用新的機會。因此由工資制度產生的現代化動力與加強家庭經濟組織的現代化動力是非常不同的。工資制度促使勞力由家庭經營和生產的結構中流入工廠及其他大型的企業組織，家庭企業的發展卻加強了個人在家庭中的地位和經濟角色。工資制度及家庭經營受不同的現代化因素影響，而這兩類因素的關係卻有待澄清。在家庭的層面和社會的層面，這兩種力量都似乎是互相衝突的。全面依靠工資賺取會導致家庭經濟單位的解體，因為生產的

安排已不太屬於家庭的範圍。另一方面，部份依賴外界工資再加上家庭農業及其他收入的家庭卻能夠維持家庭經濟的完整，因此賺取工資的家庭成員至少將來仍可能可以再投入家庭的經濟單位內。

有趣的是現代化在臺灣家庭層面上在某些方面加強了家庭經濟與工資賺取間的衝突。小規模但高效率的機械化減少了必須的農耕勞力，對不少家庭來說，它們若不另謀非農耕性的經濟企業，就要更加依賴工資賺取，這通常是在都市中的。

另外一個途徑探討上述各種現代化模式的發展是從“生活經營”的角度來看家庭組織。很明顯的，傳統經營、家庭組織和安排不一定不能與各種現代化力量相容；只是家庭為了盡量改善生活條件而以本身作為一經濟單位，並盡可能利用現代化所提供的各種好處。因此，作者認為“生活經營”和“終極期望”兩者間的關係是：後者會產生各種變化，而前者因能適應現代化的社會而得以全部或部份保存。即使“終極期望”的一些價值觀發生改變，作為基本組織的模式的家庭勞力的緊密合作和職業的分化仍會持續下去。舉例來說，女性在中國的經濟及社會地位的變遷會與“終極期望”的價值觀改變有關，那麼另一方面她們很可能同時更加深入參與家庭勞動。

健康保障與醫療技術的發展使嬰兒死亡率及一般死亡率降低，從而使中國大陸及臺灣的人口增加。這樣，農村家庭就有較多男子能活到適婚年齡，而父母壽命亦會延長。若將這些人口方面的變化獨立於現代化的動力之外來看，“五代同堂”的“終極期望”還是不大可能實現的。可是，實際上，純就人口方面來看，“聯合家庭”發生的可能性已經增高。但同時分家作為一種對經濟壓力的反應又會變得愈來愈普遍。從純人口學的角度來看，分家會導致家庭數目增加，但每個家庭的成員數目會減少。從傳統“終極期望”的角度來看，太少兒子的煩惱將被分家的煩惱取代。

人口結構的變化對家庭的大小和組織的影響顯然不能與其他因素隔離。現代化的各種動力本身、“終極期望”和“生活經營”都相互影響，所以我們不難明白為什麼在臺灣及中國大陸的報告中，一方面指出有新的家庭模式出現，另一方面又說家庭構成及組織上與傳統仍有不少連繫可尋。例如莊英章(1972)就曾報導臺灣農村“聯邦式家族”的出現。這些“聯邦式家族”中某些已婚兒子可能與他們的妻子住在都市，而父親與另外的已婚兒子則續住在農村。住在都市的兒子與原來的家庭還有部份的經濟關連，但收入已不是全部公用的了，可是仍沒有正式分家。這些安排在當地都已被接受成為習慣。“聯邦式家族”表示一種對變遷經濟制度的調適，也表示年輕一輩渴望自立的傾向。這個安排顯示一個特定的“生活經營”的安排，也顯示出“終極期望”的改變。但同時“聯邦式家族”的出現並不能單由現代化來解釋，因為對大家庭團結的重視清楚顯示某些傳統的“終極期望”還是被人看重的。

新近關於中國大陸農村家庭組織的報告也顯示現代化包括新舊因素的複雜交互作用。其中一個對四川兩個縣3,293戶的研究報導指出在研究之前三年，核心家庭的數目有顯著的增長，原因是年輕一代追求自立，因為他們較上一代受更多教育，對外界的認識也較多。但很多時分家的原因是年輕一代的技能在家庭經營上沒有用處，因而不能在家庭組織上扮演經營角色。一個有關的傾向就是離婚率雖然增加，不完整家庭的數目卻在減少。因為不是基於自由選擇而結婚的有不少都紛紛離婚，離婚後又因自己的選擇而再婚。這是年輕一代逐漸自立的另一證據(文1985)

另一個關於四川的報告比較八個縣共1,864個一般戶和182個專業戶。趙喜順發現專業戶中，家庭較大，成員中較多是“整勞動力”，而單只有一代的家庭較少，三代或以上的家庭反而較多。

由於這些家庭多由多對已婚夫婦組成，家庭組織也較複雜。這些家庭有較多成員接受較多教育，而且較多家庭有至少一個成員具專門技能。由此可見這些家庭在“生活經營”上很有技巧而且積極地利用現代化所提供的機會（趙 1985），這個四川的例子與周其仁和杜鷹（1984）在其他省份的發現脗合。

總括來說，從臺灣及中國大陸的例子來看，現代化不是全盤否定傳統模式的。在某些情況下，傳統的“生活經營”方式已足以適應新的條件，雖然在另一些方面，現代化可能與“生活經營”的重要改變有關。“終極期望”的本質與現代化的影響接觸時同樣會發生改變，甚至有重大的轉化，但“終極期望”中的某些因素可能反而會影響社會變遷的本質。更重要一點是，“生活經營”和“終極期望”都表示廣泛的價值觀和行動的安排；至少在某些方面兩者都含有不但與現代化相符合，甚至有幫助的因素。現代化會引起兩者大小不同的變化，但文化變遷是新舊的混合，所以結果仍是具有特殊的文化色彩。

引用書目

文獻良

- 1985 “經濟改革中鄉村家庭的變化”。《社會科學研究》，1985年第2期，頁20-23。

周其仁

- 1985 “家庭經營的再發觀”。《中國社會科學》，第32期，頁31-47。

周其仁、杜鷹

- 1984 “初論專業戶”。《中國社會科學》，第25期，頁74-92。

華彬清

- 1984 “「兩戶」的興起與小城鎮的功能”。《南京大學學報》，1984年第1期，頁34-38。

莊英章

- 1972 “臺灣農村家族對現代化的適應”。《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第34期，頁85-98。

馮叢林、湯造宇

- 1983 “論家庭承包制的歷史地位和作用”。《遼寧大學學報》，1983年第2期，頁43-48。

趙喜順

- 1985 “專業戶家庭特點淺析——四川省農民家庭抽樣調查情況”。《社會科學研究》，1985年第1期，頁6-11。

Fei Hsiao-tung

- 1939 *Peasant Life in China: A Field Study of Country Life in the Yangtze Valley*.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Freedman, Maurice

- 1966 *Chinese Lineage and Society: Fukien and Kwangtung*. New York: Humanities Press.
1979a “The Chinese Domestic Family: Models.” In *The Study of Chinese Society: Essays by Maurice Freedman*, pp.235-239.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9b “The Family in China, Past and Present.” In *ibid.*, pp.240-254.

Fried, Morton H.

- 1953 *Fabric of Chinese Society: A Study of the Social Life of a Chinese County Seat*. New York: Praeger.

Hanley, Susan B. and Arthur P. Wolf

- 1985 “Introduction.” In *Family and Population in East Asian History*, Susan B. Hanley and Arthur P. Wolf eds., pp.1-12.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Lang, Olga

- 1946 *Chinese Family and Societ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Levy, Marion J.

- 1949 *The Family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asternak, Burton.

- 1985 “On the Causes and Demographic Consequences of Uxorilocal Marriage in China.” In Hanley and Wolf *ibid.*, pp. 309-336.

Wolf, Arthur P. and Chieh-shan Huang

- 1980 *Marriage and Adoption in China, 1845-1945*.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